

法国调节学派： 概念体系、理论演进与启示^{*}

刘 充 姜力榕

内容提要 法国调节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以“调节方法”为分析工具，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一个历史过程予以考察。在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中，法国调节学派处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审视法国调节学派的成果和新进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进，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在制度形式、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等构成的概念体系中得到证明，而五类危机也蕴含其中；不同代际学者的研究有较强的延续性，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等问题为20世纪学者所关注，而强调国家在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21世纪的重要理论转向。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强调历史归纳、坚持矛盾分析法，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调节学派；超经济；制度形式；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 刘充，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姜力榕（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我们感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帮喜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通常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深刻的渊源。调节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代背景之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上的“滞胀”局面，同时主流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经济现实和经济学说的双重危机恰是新理论诞生的机遇。一批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借鉴凯恩斯主义和年鉴学派的思想，开创性地提出“调节方法”（regulation approach）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和内生危机。坚持这一分析工具的学者因其关注领域的不同又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其中以法国学者创立的巴黎学派（Parisian）、格勒诺布尔学派（Grenoblois）和波卡拉学派（Boccarien）最为著名，^①三个分支流派既有共识——相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又有分歧——不同的研究问题与政策主张，被统称为法国调节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的正式创立，以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在1974年预印、1976年修改并以法文出版、1979年译为英文出版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为标志，^{②③④}经过三个分支流派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了独特的概念体系，实现了持续的理论演进，是当前法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经济流派之一。

调节理论代表了战后法国的经济思想，核心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其发展变化，研究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事实的充分提炼。例如，福特主义描述的就是战后美国（和法国）的长期稳定增长。^⑤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以增速换挡回落为主要变化的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世界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长期繁荣的重建，还是国际国内经济关系的重构，都依赖于扎根中国的经济思

^① Paul Boccara, “Théories de la régulation et suraccumulation- dévalorisation du capital (1^{re} partie)”, *Issues*, vol. 32, no. 3 (1988), pp. 65 - 126.

^② Bob Jessop,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Mar 1997), pp. 503 - 526.

^③ 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④ 也有学者认为，1976年米歇尔·阿格里塔的著作《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版标志着法国调节学派的正式创立。参见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陈叶盛、胡若南：《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经济经纬》2008年第2期。

^⑤ Robert Boyer, “The Rise of CEO Pay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rend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想。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我们认为，法国调节学派在这一命题上有独树一帜的启发性，应该借鉴其历史的、综合的、辩证的方法论，立足我国实践，形成中国学派，揭示我国经济国情的新特点和新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之后，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重视。一些学者对这一学派的创立背景、代表人物、理论贡献与政策主张进行了概述，^{②③④⑤}此后很多有代表性的综述及研究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界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关注。

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思想史渊源上，学界普遍认为，在经济思想史谱系中，法国调节学派处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但是现有文献侧重继承，鲜有文献系统阐述法国调节学派怎样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杨虎涛指出其深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概念体系的基础均是马克思经济学的；^⑥吕守军通过学说史式的考察，得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启示。^⑦第二，理论演进上，绝大多数文献把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划分为两代并分别概括其代表性成果，包括第一代学者的积累体制变迁理论^⑧、发展模式转换理论^{⑨⑩}、危机理论^{⑪⑫}与长期波动理论^{⑬⑭}和第

①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② 林义相：《当代法国的经济理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③ 李其庆：《关于调节理论》，《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期。

④ 贾根良：《法国调节学派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⑤ 唐正东：《法国调节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

⑥ 杨虎涛：《马克思主义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⑦ 吕守军：《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⑧ 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年第1期，原文为“积累体系”；为保证行文一致，本文采用“积累体制”的表述，含义并无区别。

⑨ 胡海峰：《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对法国调节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⑩ 唐正东：《福特主义的形成与危机——法国调节学派阿格里塔的调整理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2-151页。

⑪ 陈叶盛、胡若南：《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经济经纬》2008年第2期。

⑫ 赵超：《法国调节学派论全球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⑬ 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⑭ 以布瓦耶(Boyer)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还提出了法国调节学派的增长理论，是积累体制之下对技术转变与经济动态的模型化描述。然而，这并不是第一代学者的代表性理论。相关评述参见夏明：《技术转变与资本积累体制——法国调节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夏明：《生产率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与经济结构转变——卡尔多—凡登定律对中国经济适用性的检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

二代学者的制度形成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①②}。但是这一划分存在把不同年代学者的理论贡献并列甚至割裂的倾向。为现有文献所忽视的是，代际研究之间既有交叉重叠又存在理论上补充和深化的延续关系，演进过程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研究前沿动向，法国调节学派的新进展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来自其他学派的批判，国内学者尚未开展相关综述。尤其是，更大范围和更多时空尺度的资本主义国别研究形成了调节理论的国家观，这是法国调节学派在21世纪经历的重要转向。然而，相关综述通常集中在评论法国调节学派20世纪取得的理论成果上，并未关注国家作为制度形式之一的变迁，以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功能。

本文希望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批判性综述法国调节学派。通过梳理概念体系，指出不同代学者之间的研究内容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叉重叠，明晰理论演进过程的延续性，并结合其局限性强调国家在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的重要转向，由此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二、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

在对经济危机的形式及原因的研究中，既有理论暴露出不同程度的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给出依赖政府调节的有效政策，背后是对短期均衡而非长期均衡、封闭经济体而非开放经济体、技术进步因素而非社会关系因素的过度关注。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危机是对均衡偏离的解释及市场可以自发调节的政策主张遭到了猛抨击。如果危机是外生的，那么为什么会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上演？怎样更好解释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在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上各不相同？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以代理人的分散决策为前提演绎得到一般性的经济规律，而不以具体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学说。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是暂时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反而对危机束手无策，尤其是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危机。法国调节学派彻底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静态的、均衡的、缺乏历史意识的分析范式。^③相反，法国调节学派认为，不能仅从个人行为出发研究经济问题，还要研究

① 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于珊、张嘉昕：《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视角》2018年第3期。

③ 任保平：《法国调节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它的借鉴》，《政治经济季刊》2019年第4期。

制约个人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历史环境。

法国调节学派主张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寻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① 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高度，指出了社会关系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强调了资本积累等过程的重要作用。同时，法国调节学派也批判了结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缺乏足够的阐释，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实现相对自主的再生产，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危机倾向且不可持续。

由此，法国调节学派建立了一套既不同于新古典又不同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独树一帜的概念体系。法国调节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发展是高度路径依赖的，因此时间（或者历史）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变量，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至少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主张根据具体的、历史地决定的制度形式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探讨经济危机的症结和出路。

概括而言，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研究当前危机时，法国调节学派敢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中分析原因、寻求办法，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对“经济学”范式的超越。具体而言，其创新之处有二。一是强调超经济（extra-economic）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运行方式却存在显著差异，局限于既有范畴内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法对此予以说明。法国调节学派认为，经济制度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积累体制并有相应的不同调节方式，所以超经济因素是概念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二是打通微观和宏观的视角。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宏观，但是，经济代理人的主体性不容忽视，相较于资本关系的一般逻辑及其支撑结构，不同社会力量的策略更为重要；^{②③} 新古典经济学侧重微观，但是，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研究他们处于其中的生产方式对他们行为的约束。法国调节学派指出，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存在由“制度形式”构成的中观层面，不仅指导微观经济主体的行动，

^① Michel Aglietta, *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s Etats-Unis*, Paris: Calmann-Lévy, 1976.

^②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③ 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而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应该从对资本积累的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分析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的历史演变。

而且通过“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影响“发展模式”即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

图 1 按照上述两个维度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理论，其强调超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作为经济学理论，其尝试建立经济因素中微观和宏观的联系，由此创造出新的概念工具，本文在这一节予以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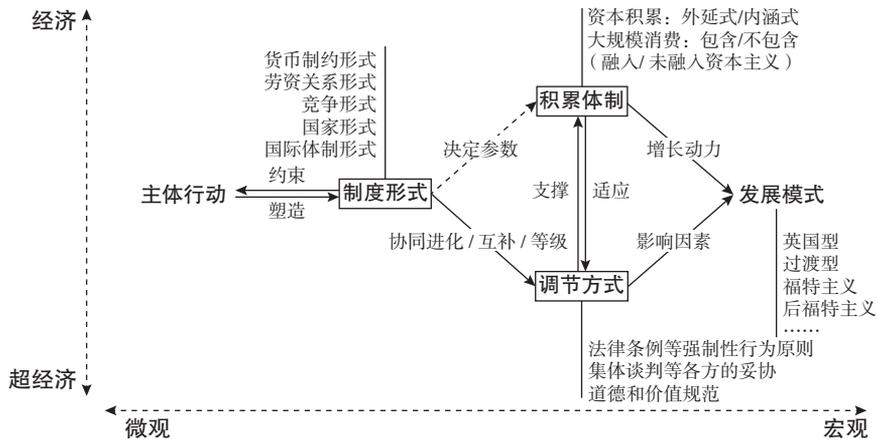


图 1 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

来源：作者绘制。

制度形式 基本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以理性人假设之下的个体行为加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此时，制度只是原子化个体博弈达到均衡的产物之一。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断证明，个体无法独立于制度而存在：一方面，个体行为直接产生了制度；另一方面，个体需要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之中行动。^① 以此为基础，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市场是一种建构，资本的积累过程和经济的发展过程被一定的制度形式具体地制约着，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过程由此得以持续。具体而言，有五种制度形式：货币制约形式、劳资关系形式、竞争形式、国家形式、国际体制形式。^② 其中，货币制约包括支付和信贷的一整套规则，只有这一制度形式被建立并合法化之后，商品关系主体才能活动，因此货币制约形式不仅会影响价格水平，而且会影响到生产、消费、就业和整个积累过程；^③

① Hervé Defalvard, “L'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 à l'école des institutions”, *Économie Appliquée*, Document de travail No. 2, Paris: CEE.

②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③ Michel Aglietta and André Orléan eds., *La monnaie souveraine*, Paris: Éditions Odile Jacob, 1998.

劳资关系形式是支配雇佣劳动的规则，由生产组织形式、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构成；竞争形式是价格形成过程，取决于资本家之间的典型关系结构。由于竞争形式的多样化，调节理论重点研究了自由竞争体制、垄断竞争体制和行政干预体制三种竞争形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①②③} 国家形式指的是国家—经济的关系结构。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无论何种市场经济，都需要国家机构制定财政、产业和金融等领域的政策，因而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批判了一般均衡理论让经济完全独立于法律和政治的幼稚想法；国际体制形式是将民族国家与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规则的集合，涉及商品与服务的流通、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等。这些制度对国际体系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却不会为全球化进程加剧所破坏。布瓦耶指出，制度形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再生产的规律，^④ 其中最关键的是劳资关系形式，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⑤⑥}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劳动（而非劳动力）不能被视为一种商品，所以瓦尔拉斯式的劳动市场供需均衡难以真实存在。^⑦ 劳动合同作为一种雇员和企业家的从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决定了双方在工作强度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了劳资矛盾的出现。

积累体制 维持第一部类（生产部门）和第二部类（消费部门）相互平衡的再生产模式，是确保资本积累过程的普遍性、消除自身扭曲等问题的一套规则，包括生产的组织形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的时间、社会各阶级（阶层）再生产的价值分配原则、需求侧社会消费的量 and 结构等，刻画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及其影响因素。法国调节学派的实证研究表明，积累体制虽然

① Michel Aglietta, *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s Etats-Unis*, Paris: Calmann-Lévy, 1976.

② Jean-Pierre Bénassy, Robert Boyer and Rosa-Maria Gelpi, “Régulation des économies capitalistes et inflation”, *Révue Economique*, vol. 30, no. 3 (May 1979), pp. 397 - 441.

③ Jean-Pierre Bénassy, *Macroeconomie et Théorie du Déséquilibre*, Paris: Dunod, 1984.

④ Robert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回顾历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具体的社会关系可以随着制度形式发生演变，例如在行业危机时期的雇员会争取限制降薪而要求按贡献分享收益，这就使得劳资关系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工资等于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形式。参见 Robert Boyer, “Les salaires en longue période”, *Économie et statistique*, vol. 103, no. 1 (Sep 1978), pp. 27 - 57.

⑥ 这种分析与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理论相比又更为特殊，因此也被称为“中间层次”的分析。参见大卫·科兹：《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之比较》，张宇等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⑦ Robert Boyer, “Le lien salaire-emploi dans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Autant de relations que de configur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Cahiers d'Économie Politique*, vol. 34, no. 1 (1999), 101 - 161.

表现出多样性但是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核心参数上的差异——资本积累、大规模消费。^{①②③④} 资本积累包括外延式和内涵式，前者主要依靠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劳动过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后者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难看出，这种分类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紧密相关，前者对应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对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大规模消费在历史上逐渐广泛地融入了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早期，有大规模生产但是不伴随大规模消费；随着资本主义的工资率提高（以及与之对应的利润率下降），消费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依赖也增强，大规模消费的经济现象随之出现。

上述两个核心参数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竞争形式和劳资关系形式，因此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积累体制的多样性。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过四种主要的积累体制（见表 1）。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直到 1890 年左右，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起步期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都没有太大变化，此后随着以劳动的同质化为基础的新的积累体制的巩固，内涵型增长才代替了外延型增长。内涵型之中，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是包含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式积累体制，集中出现在二战以后。法国调节学派对其形成与崩溃的阐释及其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关系的分析在认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其他经济学流派所广泛借鉴，本文将在第三节予以综述。

表 1 资本主义的四种积累体制

		资本积累	
		外延式	内涵式
大规模消费	包含/融入资本主义	18—19 世纪的英国	19 世纪的美国
	不包含/未融入资本主义	20 世纪后期的美国	二战以后的 OECD 国家

来源：参考 Robert Boyer,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capitalismes :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et des cris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5, 有修改。

① Hugues Bertrand, “Accumulation, régulation, crise: un modèle sectionnel théorique et appliqué”, *Revue Économique*, vol. 34, no. 2 (Mar 1983), pp. 305 – 343.

② Robert Boyer, “Wage Labor Nexus, Technology and Long Run Dynamics: An Interpretation and Preliminary Tests for US”, in Massimo Matteo, Richard M. Goodwin and Alessandro Vercelli, eds., *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 vol. 321, Berlin: Springer, 1989, 46 – 65.

③ Michel Juillard, *Un schéma de reproduction pour l'économie des États-Unis: 1948 – 1980*, Paris: Peter Lang, 1993.

④ 山田銳夫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归纳：变量之一是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组合方式，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组合方式；变量之二是生产率上升的幅度。由此可见，积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涉及价值向资本转化的界限、如何生产、如何扩大再生产，以及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如何均衡发展等问题。参见山田銳夫：《レギュレーション・アプローチ 21 世紀の経済学》，東京：藤原書店，1991 年。

调节方式 针对积累过程中的非均衡动态存在多种调节方式，也就是每一种积累体制都应该在特定的调节方式的框架之内运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形式多样，不同制度形式通过某种组合形成的机制也有差异，如果能够确保资本主义在一段时间内的连贯性和可行性，那么可以称之为对应的调节方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对应的积累体制下，调节方式有着具体的表现，例如，福特主义的调节方式就是支持和引导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一系列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模式，它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固有的冲突属性下，保持经济代理人的分散化决策在整体上的相容性。^① 概括而言，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法律条例等强制性行为原则、集体谈判等各方的妥协、道德和价值规范。^② 调节方式的界定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调节方式本身是不确定的。由于经济活动在不同领域的专业化，不同制度形式天然有“非相关性”，^③ 并不存在一个事先的机制确保各种制度形式的兼容性。其次，调节方式的形成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从进化论角度看，制度形式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可能，虽然制度形式重组的各种策略或对立或共存，但是制度形式的相互适应性最终会形成一种调节方式；从互补性假设看，两种及以上制度形式的互补性可以促使有效调节方式的出现，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就体现了货币制约形式和劳资关系形式的互补性；从等级制假设看，一种制度形式对其他制度形式的决定关系也可以产生调节方式，例如货币制约的收紧或放松均会对劳资关系的结构产生影响。^④

发展模式 对应的调节方式支撑现行的积累体制，二者相互契合，共同构成了发展模式。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变化、经济增长的强度和危机的性质等。调节方式和/或积累体制的转变引起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生运动规律。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共同构成了发展模式，也都以制度形式为基础，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值得关注。在起源和意义上，法国调节学派忠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借鉴了积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假设，因此，积累体制的概念比调节方式更具根本性。^⑤ 在定义上，调节方式是制度形式在协同进

^① Alain Lipietz, “Accumulation, Crises, and Ways Out: Som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 no. 2 (Jul 1988), pp. 10-43.

^② 林义相：《当代法国的经济理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③ Georges Canguilhem, *Régulation*,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74.

^④ Robert Boyer, *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⑤ 这一区别也可以解释本文图1所述调节方式对积累体制的作用是支撑性的，虽然另有学者认为这一作用是支配性的，参见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

化、互补、等级制等作用形成的一种可行机制；而积累体制则是一个抽象概念，其代表性参数来源于制度形式，本身又反过来决定了制度形式的再生产。在功能上，调节方式描述了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积累体制勾勒出长期经济增长的轮廓。

综上所述，法国调节学派的目标在于描述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实践，解释现代资本主义不同类型的危机倾向及其来源，分析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检视经济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调节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并充分论证了其存在基础、发展动力和自身矛盾；法国调节学派试图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内生运动规律，基于概念体系，梳理其代表性理论并予以马克思经济学阐释是必要的。

三、代表性理论及其马克思经济学阐释

以前文所述的概念体系为基础，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积累体制和特定的调节方式，后者对前者起支撑性作用。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在不断运动，二者相匹配则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由此得到证明；二者不匹配则导致经济陷入危机。运用这一框架，几代学者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进行了历史考察，总结出资本主义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趋势，同时也提出了法国调节学派独创性的危机理论。

布瓦耶指出，调节学派的目标就是解释发展模式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危机。^{①②③④}发展模式是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结合。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危机是一体两

^① Robert Boyer,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9, no. 1 (Feb 2000), pp. 111 - 145.

^② Boyer, Robert, "How and Why Capitalisms Differ", MPIfG Discussion Paper, No. 05/4,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Cologne, 2005.

^③ Robert Boyer, "The Rise of CEO Pay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Robert Boyer, "The Present Crisis. A Trump for a Renewed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 1 (Jan 2013), pp. 1 - 38.

面，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共同构成了刻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例如，布瓦耶认为，在缺少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式积累体制中，竞争形式的调节起决定性作用，短期导致实际工资变动不显著、名义工资变动与产业后备军的增减有关，从而抑制了大规模消费，经济增长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涵式积累体制迅速改善了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过剩、消费不足，长期导致矛盾产生和危机爆发。^①

本文将立足于其概念体系中的两大核心概念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分别介绍法国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和危机理论两大代表性成果，并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以阐述其怎样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

（一）福特主义发展模式

通过历史考察，法国调节学派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背后与之对应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几代学者的共同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英国型、过渡型、福特主义再到后福特主义、出口主义等多样化发展模式的转换，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对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是典型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伴随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式积累体制和劳资联合型的调节方式。这一时期，专用机器让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泰勒制劳动组织形式对生产劳动过程的科学分解也细化和深化劳动分工，同时提升劳动强度，二者共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同时，在劳资关系上，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生产而倾向于签订长期雇佣合同，工会的组织化使得劳动者的力量相对强大，实际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上升分别刺激了投资与消费，生产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再生产也进一步扩大，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形成良性循环，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这一理论分析是与经验相符的。具体到前文所述的五种制度形式，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创造了信用扩张及积累需要的流通手段；劳动过程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垄断或寡头的价格制定规则有利于积累体制的稳定；和谐的集体谈判和罗斯福新政催生了大规模群众消费，有利于新增价值实现，同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也有助于解决价值实现的困难；国际上美国的战后霸权体系更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法国调节学派关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模式的分析，是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循环理论的特殊化考察。

^① Robert Boyer, *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1800	20世纪	一战	二战	20世纪90年代
发展模式	英国式	过渡型		福特主义	后福特主义和出口主义等多样化发展模式
积累体制	外延式	内涵式			……
		不包含大规模消费	包含大规模消费		
调节方式	市场竞争型		劳资联合型		……

图 2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趋势

来源：参考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有修改。

其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在支付可变资本之后的部分。由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投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称为绝对剩余价值；而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应地剩余劳动时间被延长，这一部分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不是由于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对地增加，而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一部分原来的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导致剩余价值相对地增加。由此可见，福特主义下的积累体制，本质上是泰勒制等制度形式通过某种组合引致的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因为，区别于外延式积累体制，福特主义的特征是经济增长由劳动生产率驱动。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大规模消费，工资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增长推动工人阶级成为大规模消费的主体。

其二是资本循环理论。资本循环公式为： $G-W \cdots P \cdots W' - G'$ 。资本的运动过程以货币形态为起点，货币资本用于购买原材料、机器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商品资本，销售之后换回了更多的货币资本，于是又投入到新一轮的循环之中。从资本循环理论角度考察，福特主义之所以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发展，是因为其对应的制度形式在资本循环的三个环节均起到了正面作用。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工会的组织化有利于提升工资和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促进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从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专用性的大型机器投入生产和泰勒制的组织形式及管理体系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化；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供给方面的成本降低使得价格降低，需求方面的工资提高使得可支配收入提高，二者共同刺激消费，促进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最终，企业将货币资本所得用于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不断深化、积累不断增加。

（二）危机理论

诞生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的法国调节学派对危机的认识独树一帜。新古典经

济学声称危机只是例外，虽然其增长理论不断发展，模型中对技术进步的处理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的革新，但是其解释危机时依然停留在冲击的外生性上，即使一定程度上承认市场失灵的内在性，也侧重讨论如何通过政府干预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法国调节学派猛烈抨击了这一肤浅观点，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从社会关系即更为具体的制度形式出发研究经济现象。

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将调节方式与积累体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这一框架有比较强大的解释力：既可以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持续增长是由于制度形式相互适配，调节方式有效支撑积累体制；又能够说明危机爆发的根源——危机意味着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之间出现不匹配，通常是调节方式无法满足积累体制的需要。具体而言，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不适配有两种主要情况，其一是新的积累体制的出现为旧的调节方式所阻碍，其二是积累体制的潜在增长在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调节方式下被消耗殆尽。20世纪以来，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胀”分别对应上述两种情况，前者是市场竞争型调节方式阻碍了包含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式积累体制的出现最终导致危机，后者是福特主义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

通过对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同发展模式的历史考察，法国调节学派将经济危机按照不同层次划分为以下五类。^①

外部干扰危机 灾害造成短缺、战争引起破坏，诸如此类的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与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运行无关，基本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外部冲击危机。然而，尽管我们不否认偶然和意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有理由怀疑：若分析框架只考虑这一种类型的危机，则难以解释冲击造成的萧条一次又一次再现。

周期性危机 积累体制的过度积累趋势和调节方式消除这一趋势的交替出现，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非均衡。因此，这种周期性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特征，是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调节方式依然有可行性，只是在经济表现上被认为是危机，背后是不利于积累体制的制度形式占据主导地位。

调节方式危机 现行调节方式不具有可行性，相关制度无法逆转经济循环不畅的形势，不过积累体制仍然有效。例如，政治因素可能影响调节方式向积累体制妥协的

^① Robert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过程，此时积累体制并没有暴露出任何问题，只是调节方式无法克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冲突，基本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再相容。

发展模式危机 既有的制度形式达到极限或出现矛盾，由此决定的积累体制不具有可行性，增长动力停滞，影响资本主义的整体的发展模式。通常是旧的积累体制的潜在增长已经被消耗殆尽，阻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引起制度形式内部的结构性的剧烈变化。

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例，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抬升石油价格，生产成本飙升，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的萧条和“滞胀”困境。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将此次衰退完全归咎于外部供给冲击，但是调节学派更强调当时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本身的结构性的危机。首先，泰勒制之下劳动者长期重复简单劳动，劳动热情和参与意识较低，辞职增加。由此带来的生产不稳定性使得企业选择加大设备投资、减少雇佣劳动，从而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遭到压缩。其次，短期雇佣形式和绩效工资制度扩大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公平加剧了资本家和较低收入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再次，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PATCO）罢工事件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对美国工会造成沉重打击，使得里根执政期间的工会参与率大幅降低，工会组织力量被削弱，劳动者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实际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① 工人失业、收入降低、贫富差距加大等因素共同导致消费减少，相应地，投资也随之减少，于是雇佣工人的规模进一步缩小，消费持续减少，经济陷入萧条的恶性循环。同时，石油价格上涨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变化削弱了竞争形式尤其是价格信号调节市场的能力。利率上涨又阻碍了生产性投资扩大，激发了金融投机行为，使得资本大量从实体经济涌向金融行业，削弱了福特主义的大量生产基础。在外部冲击和自身结构性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福特主义宣告破产。

主导生产方式危机 制度形式重组失败，基本社会关系面临崩溃，要求推翻现行社会关系集合，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一危机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相似，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颠覆。

从法国调节学派对上述五类危机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理论上，其对马克思经济学做出了至少两个层面的创新。

其一，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辩证统一地看待调节与危机，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将危机视为例外。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以经济均衡具有稳定性

^① Anwar Shaikh,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的假设为起点，因而其逻辑推导的结论必然是危机的反常态化。但是，在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中，调节和危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繁荣期必然伴随着积累体制的过度积累，一旦超过调节方式的极限，就会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从而引发危机；萧条期则存在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制度形式的调整使得调节方式与积累体制再适配，重新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调节和危机的对立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二重性。以周期性危机为例，马克思率先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殊性并予以理论解释，尤其是利润率趋向下降引致的投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虽然法国调节学派强调的重点与其略有不同，认为周期性危机的程度取决于调节方式，但是也得出从繁荣到危机、接着从停滞到重新增长的自动转换的规律，在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是一以贯之的，在理论上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其二，发展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论述，强调制度形式的重要性。例如，法国调节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特征，主要受到竞争形式和劳资关系形式这两种制度形式的影响，扩张期会产生过度积累倾向，萧条期则会消除这一倾向，出现非均衡的调整。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受到这一论述的影响，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认为，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传统的危机理论通常从生产力出发，认为出现增长率为负、消费和投资锐减、工人大量失业等特征时即是经济危机。与之不同，法国调节学派把危机概括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到了调节方式和 / 或积累体制的某一程度上的极限的表现，因而经济复苏需要从制度形式的调整着手。因此，法国调节学派从两个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提出制度形式，具像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同一过程的二重属性理解为两个共生的子系统，调节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目的是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四、理论演进

国内学者在评述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成果时，通常依据开始从事相关研究的年份将学者划分为两代，并分别总结其理论贡献，^{①②} 却易造成两代学者及其理论并列甚至

① 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于珊、张嘉昕：《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视角》2018年第3期。

割裂的误解。仅按时间顺序区分世代的做法可能引起双重割裂：一方面割裂了学者之间的联系，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学者形成的复杂研究网络；另一方面又割裂了理论之间的联系，即试图从一脉相承的研究中提炼出相对独立的理论。

本文认为，法国调节学派各代学者的研究内容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叉重叠的，更需要关注的是理论演进过程的延续性。表 2 是法国调节学派各代学者围绕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两个核心概念展开的代表性研究。从中可以观察到，如果按时间顺序区分世代，那么第一代学者致力于理论的更新，并持续关注 and 鼓励推进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研究，在其著述中不乏涉及相关议题；对应地，晚近的法国调节学派学者仍然沿用第一代学者提出的核心概念。换言之，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并非不同学者组成的知识群体实现了代际更替，而是一支不断发展壮大且不停变化的调节学派学者队伍，经由研究方向的交叉重叠，共同持续推进调节理论的发展。

表 2 法国调节学派对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的代表性研究演进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积累体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法国积累体制的历史 • 内涵式积累体制的创新 • 美国和法国的福特主义 • 福特主义及其危机的典型事实 • 福特主义再生产公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宏观和部门计量模型 • 福特主义的多样性及其危机趋势 • 典型福特主义的替代性模式（小型开放经济体、日本、国家社会主义、拉美、东亚） • 福特主义动态增长的挑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替代性的后福特主义模式 • 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的转向 • （发展模式）转型为何如此困难 • 对美国模式潜在复苏的批判 • 全球化与制度重构（以欧盟为典型）
货币制约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货币是一种虚拟商品 • 资本主义根植于价值关系的深层次动态 • 福特主义积累中信用货币的作用 • 滞胀与福特主义的危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货币的形式 • 货币制度的危机 • 货币政策体现借贷关系 • 货币制度的转变与积累体制的转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金融化和高流动性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 • 金融套利 • 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与稳健性货币政策的重提 • 货币制度与劳资关系类型的联系
劳资关系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劳动力是一种虚拟商品 • 自由竞争 VS 福特主义的劳资关系 • 制度化妥协的作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资本主义多样性 • 福特主义的危机及其韧性 • 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后福特主义模式下的劳资关系形式 • 国际竞争与劳资关系 • 职业培训体系与教育 • 福利国家的危机

续表 2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竞争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自由竞争 VS 垄断竞争 • 自由市场价格 VS 管理价格（成本加成定价） • 企业和竞争形式的国家框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同部门和国家内的竞争类型（以日本为例） • 生产体系及其先决条件 • 创新的社会体系 • 市场复杂性与政府治理的混合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国际化与产品差异化 • 创新中的跨国公司与本土的关系 • 不取决于竞争力的积累体制 • 公司治理
国家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公共支出与制度妥协 • 有限国家 VS 嵌入型国家 (embedded state)^① • 国家是工资劳动关系的保障 • 积累体制形塑经济政策的性质和约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制度妥协的类型和国家模式 • 政治的相对自主性和国家干预的限制 • 政治体制的经济秩序 • 经济政策的国家类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转向调节主义理论：经济和政治逻辑的连接 • 国家—经济关系的分类学和福利国家的类型 • 财政—金融体制 (Fisco-financial System)^② • 经济政策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多样性
国际体制形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国际体制是霸权国家利益的体现 • 福特主义从美国至大西洋的扩散 • 拒绝将“第三世界”视为先进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战后国际结算的危机与美国霸权主义的侵蚀 • 作为经济引擎的不平衡发展 • 劳动的新型国际分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无霸权的全球治理的有效范围 • 全球化与国家制度的不稳定 • 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性联盟 • 非均衡的新来源（例如生态环境、南北差异）

来源：参考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有修改。

表 2 中的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都是法国调节学派的核心概念，在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过程中，几代学者共同努力，以研究方向侧重点的转移推进理论的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有多位学者共同从事相关研究；同一位学者的研

① embedded state 一词没有官方译法，笔者将其试译为“嵌入型国家”，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提出的“嵌入”概念。波兰尼认为“嵌入”表达了市场与社会的矛盾共存状态：市场具有无限扩张的天性，社会则需要遏制这种扩张，嵌入要求市场主动限制其扩张的边界和对社会价值的侵犯。更进一步，彼得·埃文斯 (Peter B. Evans) 以“嵌入式自主” (embedded autonomy) 解释“东亚奇迹”的出现：市场造就了有力的政府和社会秩序，而政治和社会秩序塑造了东亚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政治与市场相互塑造实现了嵌入，参见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1 期。笔者认为，“嵌入型国家”表明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并非具有完全自主性。这是一个与有限国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② “财政—金融体制”特指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财政体系。当时法国财政体系往往由世代负责王室财政的家族成员垄断，被称为“金融家” (financiers)，为了与私人银行家相区分，称“财政—金融家” (fisco-financiers)。

究也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侧重，贯穿了理论演进的始终。

现有研究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区别于第一代学者提出的发展模式转换理论，是第二代学者的创新，然而，理论演进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在法国调节学派的几代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法国调节学派创立之初，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思想及朴素表述就在福特主义的理论之下萌芽。虽然发展模式转换理论对历史上个别重大事件的解释力有限，但是经过第一代学者的及时修正，提出后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基于国民轨道分歧假说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会往一个方向上收敛，而是沿着美国型新福特主义道路、德国和瑞典型沃尔沃主义道路或日本型丰田主义道路三个不同方向发展，这一理论本身已经蕴含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雏形，为之后的资本主义五类型等学说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此后，伴随着来自学派内部和外部的批判，法国调节学派开始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上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探索。直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促使第二代学者把方法论、概念体系和相关代表性理论都统一到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认识之下，《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①和《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理论是可能的吗？》^②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考察理论演进过程，两个方面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引了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侧重点的转变，二是来自学派外部的批判和竞争。

第一，法国调节学派强调基于历史的分析，毫无疑问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法国调节学派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因此其首要任务就是考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提出福特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其何以经历繁荣和遭遇危机。此时，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并将其树立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模式，在考察国家形式、国际体制形式等制度形式时忽视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进入 80 年代，福特主义的时代走向终结，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视野随之扩大到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研究发现，一些曾经的福特主义经济体在经历危机后通过不同路径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如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和科尔执政时期的联邦德国；^③一些曾经的非福特主义的经济体则尝试运用福特主义法则，最终形成

①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Robert Boyer,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s New Becomes O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③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了带有福特主义特征却又不同于福特主义的新发展模式，也被统称为后福特主义。显然，这些后福特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制度形式等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各种手段克服了福特主义的困难和危机，同时也酝酿了后福特主义自身无法避免的危机趋势。到了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模式的潜在复苏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学者们愈发认识到资本主义存在差异化发展路径和多样化发展趋势，需要对更多国家进行历史考察。相应地，在国际体制形式研究中，学者们不再局限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关注南北差异、不平衡发展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世界正在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收敛”的历史终结论，倡导新自由主义，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提出就以此为背景，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驳斥。法国调节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类型化的比较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存在不同类型，而且均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率，从而在两个层面进行了回应，既否定了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率的”和“唯一有效率的”等错误观点，又否定了世界正在向这一模式收敛的假说。法国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各种资本主义即使不是市场主导型的，通常也是稳定并有效率的。首先，通过历史考察可以确认各种资本主义类型的存在，而且其固有的各种制度形式之间具有互补性或呈现等级制，通常具有排斥外来制度的特点，资本主义最终将保持多样性的演化，而不会朝着单一的、既有的、特定的一种模式收敛。其次，通过比较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效率可以发现世界向美国型资本主义收敛缺乏必要性，绝不是其他国家应该追求的。此外，各个学派之前就已提出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学说，而法国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五类型学说是各种类型化理论之中最趋于完善的学说。法国调节学派吸收了比较制度分析学派（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制度互补性理论，提出了“社会创新和生产体系”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产业发展中最关键的制度。^① 由此，法国调节学派的宏观分析得以延伸。在经验研究中，布雷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将21个OECD国家和五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置于同一个坐标系中，以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为横轴，以社会福利的发达程度为纵轴，不仅可以清晰地表现各种资本主义类型的不同特征，而且可以看到划分在同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印证了子制度之间的互补性。

^①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通过梳理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脉络，可以概括得到法国调节学派理论演进的三个趋势。^① 一是注重扩展对新研究领域的增量经验研究。特别是，以更广泛的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扩展到美国 and 法国以外的经济体，拓宽到国家以外（包括国家以下和国家以上）的各种空间尺度。二是在坚持调节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复杂和更为先进的概念深化，对法国调节学派已经提出的研究问题做出更好回答。具体而言，学者们在研究中更详细地关注了具体而复杂的调节过程、多重决定因素，强调国别研究和案例分析，尤其注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身的路径依赖性以及转向替代性发展模式的路径塑造机会。三是推翻乃至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理论中的假设、概念和论点。对于与早期调节学派学者或研究割裂的主题，在理论上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批判，本文将在下一节对研究前沿动向的综述中展开。

五、学派的理论局限性与研究新进展

现有文献通常集中在评述法国调节学派 20 世纪取得的理论成果上。其间，依托关联经济视角与超经济视角的概念体系，经过三个分支流派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演进清晰而深刻，成为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之一。然而，在现实结果上，20 世纪的法国调节学派是让人失望的，法国左翼政府最终没有采取他们的政策主张。杰索普（Jessop）将其概括为双重失败：既未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不应该把超经济现象视为无关紧要的、边缘的或被“其他条件相同”一言以蔽之的；又未能说服主流社会科学家，若不考虑经济机制则积累是无法被有效解释的。^② 此外，在与其他学派竞争过程中，法国调节学派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的背景下，法国调节学派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发展及危机，分析方法让人耳目一新；但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霸权地位巩固，以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等研究范式相继出现，法国调节学派的解释力和独特性不再显著。

^①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② Bob Jessop,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Mar 1997), pp. 503 - 526.

上述问题的背后是调节学派的理论局限性。其中，一些不完善之处已经在学派研究新进展中被及时补救，只是鲜有文献予以梳理；而另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或缺陷可能构成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困境。本文认为，指出这些理论局限性并做出区分是有必要的，可以避免法国调节学派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一）结论的一般性推广与学派的国家观

法国调节学派对发展模式演变的历史归纳缺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支撑，难以得出更一般性的结论。法国调节学派在提出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之后，试图将其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入这一类型的框架之中，难免有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固化的嫌疑。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一修正依然有将特定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化”和“特权化”的倾向，容易忽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①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以新的类型取代旧的类型，那么“类型多元论”就只是旗号，最终仍将走向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不可知论”或“历史终结论”。^②因此，需要新领域的增量经验研究，特别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美国 and 法国之外的经济体，并拓宽到国家以外（包括国家以下和国家以上）的各种空间尺度，否则难有真知灼见。

目前，学者们把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的研究提上了研究议程，不仅强调了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危机和对后福特主义轨迹的探索，包括在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调节方法；^③而且对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④同时讨论了国际化的影响。^{⑤⑥}由此，更多国别研究共同形成了调节理论的国家观，这是法国调节学派在 21 世纪经历的重要转向。

新进展表明，法国调节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之间可以轻易结合，因为国家在经济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之中，不同学

① 于珊、张嘉昕：《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视角》2018年第3期。

② 山田锐夫：《さまざまな資本主義》，東京：藤原書店，2008年。

③ Robert Boyer, "The Present Crisis. A Trump for a Renewed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 1 (Jan 2013), pp. 1-38.

④ 杰索普提出国家理论时，以“把国家放到资本主义学术研究的适当位置”（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作为副标题，强调了国家（与政府制度）在经济层面和超经济层面的影响力，明确了应该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更大的脉络中研究国家的思路。

⑤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⑥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派对国家持有不同立场，分歧或许来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国家的分散的叙述。^① 杰索普延续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即国家权力反映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 (balance of social forces)，倾向于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最终是对政治策略、资本积累体制、领导权方案之间冲突竞争的整合。^② 根据法国调节学派的一般观点，可以得出国家作为制度形式之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经济的社会嵌入性及经济层面以外的调节，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再生产而言是必要的；经济层面以外发展出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可以通过时空修补延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助于经济的再生产。^③ 虽然各种自我组织系统只关注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条件，但是这些系统之间在物质层面是互相依赖的，最终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结构耦合并演化同步，确立了国家的自主性，从而调节是可行的。然而，这并不直接意味着调节的有效性。资本需要国家作为超经济因素对积累发挥充分的调节功能，但是国家形式决定了其程度和水平，换言之，资本不仅需要国家而且需要恰当的国家形式。基于此，调节理论的国家观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区分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④

基于国家的形式和经济调节功能的视角，法国调节学派的新进展完善了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个代表性理论，既概括了福特主义的国家类型与历史特殊性，又补充了危机理论的国家维度。^{⑤⑥} 具体而言，福特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可以概括为“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类型，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确保充分就业，并通过集体谈判的调节方式来影响收入分配，从而提高国内有效需求、维持经济增长，同时国家（或政府）被期望干预市场失灵。战后在许多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成熟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长期

① 梁书宁整理了其中的六种主要定义，包括：国家是在经济生产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的寄生体制；国家仅是反映生产关系及其经济斗争结果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要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套制度集合体；国家是一种对于阶级斗争有特殊影响的政治支配体系。参见 Bob Jessop:《思索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梁书宁译，台北：国立编译馆，2008，译者导读。

② 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Cambridge: Polity, 1990.

③ Bob Jessop,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④ 何子英、郁建兴：《国家的形式充分性与功能充分性——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理论述评》，《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

⑤ Bob Jessop,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Mar 1997), pp. 503–526.

⑥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被认为处于某种危机之中,^① 在国家维度上主要体现为经济危机、财政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话语（或意识形态）危机，这是国家理论重要转向之下的法国调节学派的共识。

然而，学者们对危机成因莫衷一是，关于这一类型国家制度形式及相关的调节方式的替代性方案也没有定论，福利国家与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的研究问题。布瓦耶和萨亚尔（Saillard）把凯恩斯式福利国家定位为围绕资本主义中经济与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而组织起来的集合体。^② 杰索普认为，国家作为重要的制度形式与资本积累互相塑造，于是不同的福利国家在巩固特定的积累体制及其相应的调节方式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凯恩斯式福利国家正在被“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后国家”渐近取代。^③ 其中，“熊彼特式”意味着经济政策组合侧重于开放经济体中的创新与竞争力，逐渐强调供给侧，从而推动知识经济；“工作福利”意味着社会政策组合是对福利体制的深刻重组，社会工资有下调的压力；“后国家”是指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尺度已经相对化，在制度形式的等级上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二）制度形成的新见解

法国调节学派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对制度的形成过程缺少系统性和创新性的见解。制度是基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④ 介于微观和宏观之间，既是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理论基础，又是个体行动承载并改变的对象。然而，相关研究集中在对制度的概念界定、形式划分与作用阐释上，对于制度如何形成却鲜有相对完整的论述。

研究前沿关注制度和经济之间怎样相互作用，哪些制度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现代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制度转变引起的金融化及其特征与危机。^{⑤⑥} 其中，制度形成

① 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告诉我们，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危机，显然不是外部干扰危机，既可能是内部的危机（crisis in），即周期性危机、调节方式危机或发展模式危机，也可能是本身的危机（crisis of），即主导生产方式危机。

②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③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④ Robert Boyer, *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⑤ Michel Aglietta and Régis Breton, “Financial Systems, Corporate Control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0, no. 4 (Dec 2001), pp. 433 - 466.

⑥ Daniel Detzer and Eckhard Hein,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The Case of Germany”, IPE Working Papers No. 44, from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4.

理论最具代表性。^① 法国调节学派指出制度是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为，各个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表现为追求自身利益时会产生社会冲突，制度就是为了调节前述社会冲突而产生的。这一过程需要政治媒介的参与。社会主体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各个主体之所以能够相互妥协，主要是因为政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政治成本的存在使其不会被轻易打破。法国调节学派还强调历史的影响，认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的约束，所以结果通常是唯一的。由此可见，制度形成理论是对概念体系的深化，构成了法国调节学派的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回应了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

制度形成理论也是法国调节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独特见解，国内学者对这一观点有详细的比较论证。^{②③} 例如，比较政治制度分析理论在青木哲彦等人的努力下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得以迅猛发展，认为制度在有限理性的个体对他人行动规则的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表征协调共有信念。与之类似地，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等也认为代表性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法国调节学派并不关心个体行动是否完全理性，因为利益冲突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尚未解决的理论局限性问题

法国调节学派的发展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危机，主要归因于其长期以来的固有的理论局限性，集中表现为法国调节学派存在偶尔偏离甚至是否定马克思经济学传统的问题。^{④⑤}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调节方式与积累体制的互动缺少更全面和更辩证的分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同时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是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却易将其割裂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中，积累体制强调维持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稳定的比例关系，属于物质资料再生产；调节方式强

^① Bruno Amable and Palombarini Stefano, *L'économie N'est Pas Une Science Morale*, Paris: Raison d'Agir, 2005.

^② 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 于珊、张嘉昕：《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视角》2018年第3期。

^④ 陈明忠：《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连载），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372.htm~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377.htm，2021年12月31日。

^⑤ 胡海峰：《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对法国调节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调制度形式如何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属于社会关系再生产。虽然法国调节学派也承认调节方式对积累体制的变化发挥着支撑性作用，但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再生产理论的二重性。^① 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二重性，代表性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嵌入性，由此解释了不同的社会动态和经济危机。^② 然而，这一局限性涉及概念体系是否（能否）自洽，依然有待突破。

其二，虽然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的、无法避免的，但是并不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法国调节学派依据的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政府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和干预。然而，积累体制的变化应该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再生产为前提，^③ “积累体制内部的生产和交换的数量关系应该隶属于围绕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而展开的那些斗争”。^④ 因此，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形式只是特定的阶级力量平衡关系的制度化，缺少对阶级斗争决定积累体制进一步影响发展模式的逻辑的历史考察，也就不够重视对第五类危机的研究，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颠覆。

其三，在方法论上，法国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猛烈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应该基于资本积累的具体过程，由此分析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的历史演变。但是，现有研究存在过度强调历史分析的倾向。显然，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这一模式是具体的、历史地决定的。此时，案例分析不可避免地成为法国调节学派的主要工作。然而，这一倾向可能导致归纳的不完备或不简洁，而且理论不具有超越既有经济实践的可延展性。应该把历史考察上升为既有解释力又有一定预测性的理论建构，推动相关研究的新一轮繁荣。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对后福特主义的界定、对经济与政策的双向影响的描述，依然是法国调节学派亟待解决的问题；其理论局限性还体现在对边缘化国家及其与中

① 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② Olivier Favereau, “Conventions and Régulation”, in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312–319.

③ 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阶级和集团总会利用一切可能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④ Simon Clarke, “Overaccumulatio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Capital & Class*, vol. 12, no. 3 (Nov 1988), pp. 59–92.

心国家的关系的长期以来的忽视上。^{①②}

六、结论及方法论启示

经过此前的批判性综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国调节学派开创了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一般分析框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提供了独特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进，依据现实图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创新。其基本假设是：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存在由制度形式构成的中观层面，其对发展模式的影响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积累体制也存在对应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对积累体制起支撑性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由此得到证明，而危机也蕴含其中。运用上述框架，几代学者持续推进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等问题的深入国别研究，总结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历史趋势和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后国家等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未来可能。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法国调节学派都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危机、增长与多极化趋势的认识。

这一学派的最独特之处在于方法论，这是现有文献不够重视的。在法国调节学派内部，不同学者在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上略有差异，甚至对于资本主义这一研究对象的命运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方法论上高度统一，使用相同的“调节方法”是法国调节学派形成的最根本的、最原则性的共识；在法国调节学派外部，与其他学派相比，绝大多数学者强调其在概念上或理论上的区别，但是这些区别都可以追溯到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法国调节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彻底否定体现在对其方法论的批判上。^③ 概括而言，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以综合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探索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互动表现出的规律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

^① Gajst Natalia,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Revision”, *Vision de Futuro*, vol. 13, no. 1 (Jan-Jun 2010), pp. 1 - 16.

^② David Neilson, “Remaking the Connections: Marxism and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4, no. 2 (Jun 2012), pp. 160 - 177.

^③ 任保平：《法国调节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它的借鉴》，《政治经济季刊》2019年第4期。

三个方面。

第一，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同时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无论是概念体系的形成，还是理论演进的深化，法国调节学派的发展都强调学科交叉，广泛借鉴和运用历史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范式，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并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密集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规定的网络框架中进行的，^① 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产物，而且是社会斗争的产物。从社会关系出发，调节学派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制度形式等中观层次的概念，以衔接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② 既摆脱了将微观个体行动简单加总即等同于宏观的传统整体主义，又批判了去社会关系化的纯粹个人主义。

第二，强调历史归纳。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关于演绎和归纳的争论以来，抽象演绎成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主流方法论。^③ 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认为，过度抽象可能导致模型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④ 法国调节学派就格外注意从经济事实到经济理论的过程，强调历史归纳。通过对不同国家及其不同时期的考察，概括出制度形式、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等形成概念体系，从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事实中总结出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等特定的发展模式，得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规律一般的经济规律特殊，是法国调节学派的关键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基于调节方式和/或积累体制的转变，提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理论，进而发展得到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最终实现与国家理论紧密结合的重要转向，是理论和现实反复接触检验的过程。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法，实现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的超越。法国调节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以贯之的辩证逻辑，遵守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研究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经济规律的动态。其中，矛盾分析法强调矛盾运动的重要性，即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会发生转变，经济规律也相应调整。以发展模式的转换为例，福特主义条件之下，投资—消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缓解冲突的关键制度是劳资关系形式；步入后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之后，

① 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

② 吕守军：《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③ 新古典经济学延续了这一方法论，试图通过逻辑推理得到普适性的经济规律，包括均衡的稳定性和危机的外生性。虽然其逻辑推理环节是严谨而精巧的，但是其假设和原理本身过度抽象，脱离了生产关系的范畴，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却过度理想脱离实际的结论。

④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马春文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

货币制约在制度形式之中起决定性作用。以调节和危机的对立统一为例，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二重性。矛盾的变化引起经济规律的动态，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好，危机也罢，都不存在颠扑不破的铁律。以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趋势为例，阿格里塔提出的“时间可变性和空间多样性”就是对矛盾分析法的运用。^①一方面，制度形式随时间变化，引导经济主体行动的变化，当其形成的调节方式符合积累体制发展的需要时，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否则爆发危机；另一方面，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经济结构也因此表现出独特性。

当下审视法国调节学派的成果和新进展兼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上，法国调节学派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强调历史归纳、坚持矛盾分析法的方法论，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创建中国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实中，虽然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但是其围绕制度形式展开的规律洞察和政策主张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重要参考。尤其是，法国调节学派的国家理论转向有极强的指导性，研究国家的形式变迁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功能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正在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危机寻找出路，包括长期繁荣的重建需要以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为基础、国际国内经济关系的重构依赖于自我组织的治理。近年来，我国进入以增速换挡回落为主要变化的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世界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②在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新百年，更应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从制度形式等变量入手，联系起经济和超经济，以及经济中的微观和宏观，提供更多的研究切入点和增量政策工具包；更应该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举措、新成就，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总结提炼新经验，形成中国自主的调节理论等知识体系；更应该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矛盾，遵循符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新发展理念，辩证看待两个大局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① Michel Aglietta, *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 : l'expérience des Etats-Unis*, Paris: Calmann-Lévy, 1976.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Core Concepts,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Liu Chong Jiang Lirong

Abstract: Born i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in economics in the 1970s,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FRS), theoretically inspired by Marx and other radical economists, advocates studying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MP)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as a leading paradig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the achievements and new progress of the F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F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find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forms, mode of reg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regime jointly determine the capitalist economy’s self-regulation, self-renewal, and self-development, where five types of crises are also involved. There is a strong continuity of studies among schola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and the exportism as a dominant mode of growth in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EANIC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 while emphasizing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state in regulation is an essential theoretical turn in the 21st century. Regarding methodology, the FRS pays attention to complementary economic and extra-economic mechanisms, integrated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induction, and contradiction analysis, all of which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Key words: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extra-economic; institutional forms; theoretical evolution;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uthors: Liu Chong, research member of Institut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Jiang Lir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